

年龄文化与干支、科举等问题

◆ 蒋星煜

郝铁川先生日前发一短文，谈论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等中国特有之年龄文化，深受启发。此一领域，近代学术界未能重视，确实是一种疏失。

年龄文化不仅为中国五千年精神文明所衍生，其内容之丰富复杂，可谓包罗万象，涵盖之广，难以设想，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更有密切交叉。

年龄文化亦有通俗与深奥等不同层次，例如“甘罗十二为上卿”，主要勉励少年能发奋有为，亦可成大事业。《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提倡学习贵在坚持，稍晚不妨，仍有立言、立功、立德之机会。王勃《滕王阁序》：“童子何知，躬逢圣饯”，则既是谦逊，也含骄傲的一面，十分巧妙。“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则谓人之际遇，往往与当时君皇用人之年龄偏向有关，诸如此类，均属于通俗方面，比较容易发现。

管见以为年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国自古以来用天干地支纪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也有自然科学方面，如日照、月之盈亏等有内在联系，兹从四方面作一极简略之论述。

一、年龄与属性

中国的年龄文化和天干、地支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天干，亦称十干，包括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字，通常用作记录先后顺序。但较复杂的顺序用十个字不够，于是再与地支的十二个字相搭配。这十二个字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如此使用，就产生了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个顺序的标识。

一个人活到了六十岁，便称“年已花甲”。十分有趣的是这地支十二个字，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联系了起来：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生于寅年，便属虎。这一风俗习惯，早在汉代便已流行了。

现以寅年为例，明代著名文学家，也是书画家的唐寅，干脆以一生的地支为名，他生于明代成化六年（1470），这年为庚寅年，属虎，所以字伯虎。他的书画负有盛名，而在民间通俗文学作品中，《唐伯虎点秋香》更是流传甚广，妇孺皆知，是苏州评弹作品中的经典之一。

也有人以天干为名的，如现代著名戏剧家，曾在延安多年，改革开放后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张庚，生于1910年，那是庚戌年也。

十二生肖当初如何产生的，众说纷纭，虽然以鼠为首，但众人心目中，鼠为不上档次的动物，“鼠辈”等称谓，可见鄙视之程度。而龙则为传统中最尊贵之动物，故称皇帝为龙，所穿之袍为龙袍。生于龙年者往往以龙为名字。用鼠为名者，有《十五贯》中窃贼名娄阿鼠，乃艺术虚构也。

传奇作者之中，《浣纱记》系经典名著出于梁辰鱼之手，此人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辰属龙，故字伯龙。

此人之名与字与稍早之唐寅，字伯虎，如出一辙，《徐朔方集》第二卷《梁辰鱼年谱》，不知当年苏州之习俗，推定梁辰鱼生于正德

十四年（1519）。

如今可以证明采取此一方式取名与字似乎无关宏旨，但对于推断历史人物亦有其不可漠视之取证作用，应该说，也是年龄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年号与干支并行不悖

对于封建王朝之年号与天干地支同时使用，可以互相引证，不致发生讹误，例如王羲之《兰亭集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即是一例。今按流传拓本或摹本，“岁在癸丑”，似为添加。王羲之何以要添加此四字，显然恐后世把年份弄错，于是再添加此四字，以确证为永和九年也。

封建王朝之公文当然采取贞观、皇祐、成化、康熙之类年号，被贬谪之臣僚以及身居草野之布衣或隐士，自然不一定采用年号，往往径用干支。

至于年号、干支均摒弃不用者亦有，例如潘岳《秋兴赋并序》，一开头就是“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当时是晋武帝咸宁四年，干支为戊戌。潘岳不用咸宁，也不用戊戌，而把自己的年龄称春秋，并不出之于偶然，在态度上属于倨傲而狂妄，因为当时自视甚高，仅仅被任为太尉贾充的幕僚，虎贲中郎将，只管管宫廷仪仗事宜，品级不高，俸禄不厚，无任何实权，满腹牢骚，即抑制不住而流露了。

陶渊明《自祭文》：“岁惟丁卯”，乃宋文帝元嘉四年（437），此时他不居官职，身为隐士，所以故意不用“元嘉四年”，以显示其隐士身份，生或死与朝廷无关也。

韩愈《祭十二郎文》更奇，开头为“年月日”三字，等于空白，另有《文苑英华》亦收此文，题为《祭侄老成文》，开头一句为“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据后人考证，“五月”错了，应该更晚一些。

苏轼《书上元夜游》，以“己卯上元”开端，不书哲宗年号元符二年，是因为当时被贬到荒蛮之地的海南岛儋州，已为化外之地，不提皇帝年号为是。《前赤壁赋》也是贬官时作，地处黄州，即“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之处。开端即书“壬戌之秋”，壬戌乃宋神宗元丰五



▲ 陶渊明



▲ 韩愈

为风流名士，非利禄功名之追求者，所以只是说：“园开于乙亥之仲冬，至丙子孟春，草堂告成”。“乙亥”与“丙子”分别为崇祯九年、崇祯十年。后又说“于是疏凿之工复始，于十一月自冬历丁丑之春，凡一百余日……”“丁丑”应是崇祯十一年了，就是说这座园林经三年之久方造成。

毛晋刻《六十种曲》，先后分六次刻成，前面每次均有崇祯年号，书未完成，明代已亡。毛晋仍继续此一工程，均无清代年号，而仅书干支，是其民族思想有以致之。

三、干支与科举之年份

一般解释年龄相同为同年，但在中国古代社会，这一词汇主要用于科举。

汉代以同时被举为孝廉为同

随后封建社会一直沿袭这种制度，宋代也不例外。

非常有趣的是北宋时苏轼、苏辙为亲兄弟，均为苏洵之子。苏轼生于景祐四年（1037），苏辙生于宝元二年（1039），但两人同时于嘉祐三年（1058）同登进士科，他们便成了戊戌科的同年了。今人如果不解，还以为他们是双胞胎了。

明代、清代不仅最高一级的会试中试者称同年，中等一级乡试中举者亦称同年，而同年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发展到了极点，而在汤显祖身上有了集中的体现。

万历五年（1577），按甲子顺序，称为丁丑科。因汤显祖文名远扬，内阁首辅张居正有意拉拢，派族人向之疏通承允他一定能高中巍科，条件是做他的儿子张嗣修的陪衬。这正是其他参加会试的举人求之不得的，但汤显祖断然拒绝。会试结果，沈懋学为状元，张嗣修为榜眼。而汤显祖当然名落孙山。就这样，张居正设计的让汤显祖与张嗣修成为同年的阴谋落空了。后来几次会试，汤显祖依旧未被录取。

张居正罢官死去，再进会试时，已是万历十年（1583），癸未年会试，汤显祖以三甲第二百一十一名中进士，却又成了内阁新的首辅申时行的儿子申用懋、申用嘉，内阁次辅张四维儿子张甲征的同年。申时行、张四维利用这一机会又对汤显祖软硬兼施，企图使汤为其爪牙。汤显祖千方百计婉拒，仍触怒了申时行、张四维，官途饱受折磨，最后回乡，专心写作，完成《临川四梦》巨著。

又有《四进士》一剧，以毛朋、田伦、顾读等四个同年进士为题材，歌颂了毛朋的秉公执法，惩办了顾读等同年。经查对《皇明进士登科录》，确有毛鹏其人，为官清正。而其他三人均未出现于登科录，有可能出自虚构。

四、文人自报年岁之原因

孔融《与曹操论盛孝章书》为传世名篇，孔融以兄长自居，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始为满，融又过二”。要以一种居高临下之势，要求曹操设法去救东吴名士“困于孙氏”的盛孝章。因为盛孝章已面临被孙权

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主要是说他自己未老先衰，恐难保长寿。韩愈之所以如此未老先衰，主要原因之一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因主持公道，主持正义而得罪权贵，遭到贬斥。《谏迎佛骨表》更是直接向皇帝提出尖锐批评，至于被贬到潮州，从《祭鳄鱼文》可以发现当时潮州简直可以与如今尚未开发的南美洲亚马逊河上流地区相似。而每次流放途中的艰苦也可从“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等诗歌中看到一二。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而明哲保身，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一直为爱国忧民而坚持正义终其一生。

韩愈在其他文章中也有类似的未老先衰的感慨，但均未有消极思想流露，可谓虽悲伤仍是满怀壮志。

又如唐代开元年间民谣：

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

这贾家小儿并非神童，事见陈鸿《东城父老传》：“开元十三年，（贾昌）笼鸡三百，从封东岳”。此时唐玄宗李隆基因天下富饶，头脑发昏，大事封禅，作为盛典，别出心裁地把贾家小儿及其笼中之鸡也排进了仪仗行列之中。如此随心所欲地胡作非为，不久引来安史之乱，而走上逃亡之路。

李贺《开愁歌》：

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歧击剑生铜吼。

他二十一岁应河南府试告捷，却又受人诬告，因其父名晋肃，而不能成进士。一场飞来横祸，使他从此思想上发生大的转折，追求幻想以求解脱，所以写了些前人从来不涉猎的神奇境界，写了人世间少见的牛鬼蛇神。这二十一岁写的是他转变的关键时刻。

五、余论

以上所论述的年龄文化的四个方面，没有作深入的分析，只是举例而言。我觉得年龄文化还有更丰富的内容：

例如“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则是充满了一种奇特的想象力，或者是科学的预言，能够设想存在完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有关烂柯山的传说也是如此，乡人进山采樵，观人对弈。不知不觉时间的消逝，观棋结束，斧头的柄都已经烂掉了。西方的《吕伯大梦》内容也与此故事相似。

还有彭祖活了八百岁，当然是神话，但也反映了人类追求长寿的愿望。但是，愿望也过于脱离实际了。所以后人说：“齐彭殇为妄作”，认为不可能也。

至于陈搏老祖一睡就是千年已属宗教范畴。南极仙翁，太上老君等等，在宗教中是永久的存在，没有寿命的问题。

我认为传说、愿望、神话不属于同一类型，基本上不属于年龄文化。唯一可以有研究余地的是姜子牙八十遇文王，其可能性也不能绝对排除也。

昔日以“长命百岁”为祝福，以“百年之后”暗喻死亡之后，如今由于综合国力增强，国人健康大有进步，长寿之乡遍布全国，周有光先生一百零七岁还健在，思路敏捷，可谓年龄文化也开辟了新的天地。



▲ 王羲之《兰亭集序》

年也。《后赤壁赋》则更简易，称是岁，同一年也。

范成大《峨眉山行记》谓：“乙未，大霁”，乙未，乃宋孝宗淳熙四年。其后又说：“丙申”，并非系年，因农历年、月、日、时均用天干地支，此“丙申”经后人考证乃指六月二十八日。

到了明末清初，这一习俗更为流行，祁彪佳《寓山注序》，其人

年，当时根据文人之德才予以提拔，为官吏之主要来源。第一次为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此次被提拔者即被称为丁未同年。彼此以年兄相称，其子女则称对方为年伯。同年有时亦形成政治集团或宗派。

唐代以同时成进士者为同年，此时科举制度日趋完备，考试成为经常举行选拔官员之途径，同年逐渐增加，相互联系风气更趋密切。

所恨，将欲杀之。

此事甚有戏剧性，曹操确实采取了行动，但并非一定出于孔融之压力，也许有使用盛孝章之企图。但行动已迟了一步，孙权已经将盛孝章处决了。而且以兄长自居的孔融后来未能保住自身，也被曹操处决了。

唐代韩愈《祭十二郎文》提到他托孟东野带的信中写到“吾年未